

※ 書目文獻 ※

何定生一九四六年致顧頡剛 未刊書函述要

車行健^{*}

一、緣起

二〇一五年九月八日，顧頡剛(1893-1980)女兒顧潮女士從美國兒子家中寄發了一封電郵給我，信中說到：

這兩年整理先父保存的他人來信，其中有何定生寫於抗戰勝利後的一通，待回京後發你一閱。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顧潮女士回到北京後，便將此函的 ODT 文字檔寄給我，方得以一窺此函內容。原信僅有少許標點，為方便閱讀，顧潮在將此函打字輸入電腦時，又添補了一些標點。原來的文字檔是簡體字，我將其轉換為繁體字，並寄回給顧潮校正，經其確認無誤。二〇一七年六月中旬，復又去信顧潮，請觀原函，顧女士將其掃描成 JPG 檔後，寄贈給我。至此，該函之原件及釋文，均得而觀之，誠一快事也！

何定生(1911-1970)就讀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期間，曾與顧頡剛頻繁通信，現可見者共有六通，均刊載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這也是今日僅能看見的何定生致顧頡剛之已刊書信¹。顧潮所藏此函未見諸《顧頡剛日記》的

本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戰後臺灣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五次學術研討會」(2017年7月13日)，原題作〈何定生致顧頡剛未刊書信述要〉。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¹ 這六通書信的具體刊載情況，參見車行健、徐其寧輯錄：〈何定生教授論著目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32-33；〈附錄：何定生教授論著目錄(增訂稿)〉，

記錄中，亦未見收於顧潮主編的《顧頡剛全集》中的《書信集》²。全函扣除標點符號，共約一千二百多字，何定生用行草書寫於滿滿三張信箋中，其中對其行跡、生活、家庭與心志多所述及，可補充和修正很多學界過去不知道的細節，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剛接觸此函時，曾與顧潮教授商議能否將其公諸於世，或可讓世人對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關係，以及何定生在抗戰軍興後的行跡有更多的了解。但因牽涉何定生家庭與婚姻事務，在未取得何定生家屬同意前，不便將其全文公布。二〇一七年三月，何定生女兒何念貽女士從美國回臺省親，在臺大中文系史甄陶教授的安排下，筆者於四月三日與何女士在臺灣大學水源會館餐敘，一同出席者尚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楊晉龍教授和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吳儀鳳教授。席間與何女士提及，擬趁何女士短暫在臺期間，為其攝製五分鐘左右的訪談短片，將攜至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於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四日舉行的「二〇一六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臺灣經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945-2015)》開題報告會」上播放，何女士當場允諾。後來在與史甄陶教授和臺大中文系博士生盧啟聰的合作下，將此訪談短片的構想擴大為對何定生教授整體生平經歷和學術成就的十分鐘紀錄短片，取名為《經師身影——臺灣大學何定生教授》³。在拍攝過程中，筆者將此函交給何女士，並徵詢是否同意公布。何女士表示要與其兄長商量，無法作主，此事遂寢。因而只能採取折衷辦法，改用重點評述的方式，向學界介紹此封書信，但對涉及何定生家庭和婚姻等私領域的部分則略而不談。這個做法得到了顧潮教授的支持。

何定生此函寫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他當時人在山東省會濟南市。函中對其一九三〇年後之行蹤交代頗詳，其中有不少可對楊晉龍根據《顧頡剛日記》、《何定生日記》、何定生一九四八年八月獲聘為臺灣大學中文系講師時所填寫的人事簡歷（以下簡稱〈簡歷〉）、對何定生家屬所進行的訪問稿等資料所編製的〈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以下簡稱〈年表〉），以及本人與徐其寧合撰的〈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以下簡稱〈情緣〉）二文，加以修正與補充，以下略述其要。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4卷第1期（2014年3月），頁131-132。此增訂稿附於拙著〈何定生與《古史辨》的《詩經》研究〉文後。

² 《顧頡剛全集》中的《書信集》僅收有七通顧頡剛寫給何定生的書信（見顧頡剛：《書信集》卷2，收入《顧頡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0冊，頁313-329），但並未收有何定生致顧頡剛的書信。

³ 此紀錄短片後上傳至 YouTube 平臺，供人自由點閱。

二、書函要旨述析

(一) 根據《顧頡剛日記》所載，何定生與顧頡剛最後一次見面的紀錄是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⁴。不到一個月後，便發生蘆溝橋事變，中國對日抗戰全面爆發。顧頡剛為躲避日寇追捕，於七月二十一日晚間倉皇逃離北平⁵。二人從此再無直接音訊聯絡的紀錄，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何定生去世後的九年，高齡八十七歲的顧頡剛才突然收到何定生的學生曾志雄教授，從香港九龍寄來何定生教授的《定生論學集》和《詩經今論》二書，並告知何定生已去世的消息⁶。〈年表〉和〈情緣〉皆依照《顧頡剛日記》所記來敘述二人關係的發展⁷，似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聯繫。但何定生此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寄給顧頡剛的書信，卻證明了二人間的聯繫絕非《顧頡剛日記》中的紀錄所能完全涵蓋；雖然顧頡剛勤於寫日記，但也很難做到有事必記與諸事畢錄的地步⁸。且由何函開頭所述「違師教已逾十年，今日始獲知郵遞之便」，似乎在此函之前，他們應已有一些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或許是顧頡剛主動與他接觸，或他透過間接的管道獲知顧頡剛的通信方式。而函末「師母亦在渝否」的問候，則顯示出他似乎知道顧頡剛和其夫人待在重慶。但對照《顧頡剛日記》和《顧頡剛年譜》，顧頡剛於該年四月十三日自重慶飛抵南京，四月十五日到徐州與其妻張靜秋(1908-1991)會面。則何定生寫此函時，顧頡剛已和其妻離開重慶，然不知此函是否仍舊寄往重慶，而顧頡剛又是如何、何時接獲此信的？此中細節俱已不可知曉。

(二) 關於何定生與燕京大學的關係，據其〈簡歷〉自述：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歷史系，修業三年畢業，獲得文學士文憑。一九四一年進入

⁴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第3卷，頁653。

⁵ 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84。

⁶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695。

⁷ 參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1-12；車行健、徐其寧：〈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初稿〉，收入拙著：《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點》（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頁207-209。案：此文原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53-66。

⁸ 有趣的是，這個情況似乎可以很好地作為當年張蔭麟(1905-1942)對以顧頡剛為主的疑古學風所提出的「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之詰難的案例，即未被記載的不一定不存在。

燕京大學研究院就讀，但僅修業一年，其於〈簡歷〉中的「已否畢業」和「學位」欄均空白未填寫，實際情況不明。然其於致顧頡剛此函中則對此敘述甚詳：

生自北平陷後即閉門寤居，嗣以協和醫院蒲教士之教，以趙時化名入燕大肄業，初進新聞學系，一年，改入歷史學系。畢業後以畢業論文（〈宣統政紀考證〉⁹，約二萬餘言，方擬發表於《史學年報》，已付印矣，而一二八之變起，然因此反得修改機會亦佳。）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金入研究院肄業，論文擬題為「庚子後之維新制度」。旋以日美戰起，大學被封閉，遂來濟南……光復以來原擬回燕大研院（哈佛獎金可繼續），已得大學三次電報，然終無車可通，無已則仍執教於此間省立臨時中學及齊大補習班，以俟交通恢復。雖目前生活不成問題，然年華之逝令人心悸，生研究院學業已延宕四年，今又困於交通，人壽幾何，前途將何以為計！是以每念師計劃人生之教而輒悵然若失也。

由此可見，他就讀燕京大學過程的曲折與辛酸。其實何定生早於一九二六年十六歲時，即考入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就讀，但在一九二九年二月退學，隨顧頡剛北上北平。之後經歷了一連串生活、感情、學業的紛擾以及與顧頡剛齟齬的風波，最終脫離顧頡剛的學術圈子後¹⁰，他又在九年後以二十八歲的「高齡」返回校園，重新當起大學生。這番的毅力與決心，著實令人敬佩。而他也努力地把握這得來不易的學習時光，縱情於知識的擷取和學術的鑽研，由此獲得燕大名師鄧之誠（文如，1887-1960）和洪業（煨蓮，1893-1980）的賞識，他在信中自述：

生畢業論文〈宣統政紀考證〉之序文為文如師所喜，此與生預研究院試之國文冠場及獲哈佛燕京獎金之榮譽，同為生最沾沾自喜之三事。

為此，他用帶著悲欣交集的心情，向顧頡剛剖述此時的心境：

然私心脈脈所引為竊喜不敢告人者，則實在於真做過「學生」，真嘗「人」之味。肉體者，固不能不先求其存在，然為「學生」為「真」學生以得知「人」，則無假也!!!何也，時不可再也。故生在燕大乃可為生命史最悵

⁹ 據 1948 年刊出的燕京大學〈歷史學系近十年概況〉所載，化名趙時的何定生係於民國三十年六月畢業於燕大歷史系本科，畢業論文為〈宣統政紀考證〉。此材料原刊於《燕京社會科學》1948 年第 1 卷，收入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下冊，頁 784。

¹⁰ 參車行健、徐其寧：〈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頁 199-207。

惕悲喜之一頁。

又說：

誠以「老而為學，如秉燭夜遊」，生得以燭光與日月爭明，要不能不為此傷心失學人之人生盛事，師毋亦笑其不失為稚子乎？

可以想見，對於一個熱愛學術而又富有才情的青年學者，他在昔日的恩師面前，對於自己因年少輕狂而將曾經擁有過的大好學習資源給輕易荒廢掉，該會是有多麼地悔恨交加！而對於目前又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求學環境，他又會是有多麼地珍惜！但可惜，他最終只能獲得大學文學士的文憑。燕大研究院深造的機會，卻因戰亂後交通尚未恢復，再也無從重續學業。對何定生而言，亦豈非傷心可悲之事？

（三）何定生進入燕京大學重新就學，但專業已從之前在廣州中山大學所主修的國文（中文）領域，改為史學領域，且從其畢業論文〈宣統政紀考證〉及攻讀燕大研究院之論文擬題《庚子後之維新制度》來看，他是正準備朝中國近現代史的方向開展他的學術事業。其大學研修的成果，具體展現在畢業論文〈宣統政紀考證〉中，然此文今日存佚與否，狀況頗不明。據其〈簡歷〉所記，係發表於一九四一年的燕京大學《史學年報》中，而又據車行健、徐其寧輯錄的〈附錄：何定生教授論著目錄（增訂稿）〉，輯錄者於此條論著下有如下的案語：

此條目據何教授〈簡歷〉所記，然燕京大學歷史學會主編之《史學年報》自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第三卷第二期出版後即中斷，共計發行三卷十二期。翻查其中篇目與作者，均無何定生撰作紀錄。又據何教授〈簡歷〉云，此文曾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¹¹

從何定生此函方得知，原來這篇長約二萬餘言的論文，本擬發表於《史學年報》，且已進入付印階段，但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後，日本軍警進入燕京大學校園，師生不得已離校（此即何函所謂「一二八之變起」）¹²。如此一來，預定刊載何定生此文的一九四一年之《史學年報》，當也無法順利出刊。而該期之《史學年報》與何文之最終下落如何，也不可得而知矣。

雖然從學歷上來看，何定生由中文專業改換為史學專業，但有趣的是，何定

¹¹ 參車行健、徐其寧輯錄：〈附錄：何定生教授論著目錄（增訂稿）〉，頁 129。

¹² 以上敘述參考《中華百科全書》「燕京大學」條（沈劍虹執筆），網址：<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6786>。

生最終安身立命之處仍是中文系，而非歷史系。決定這一切的是，何定生就讀於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時的老師傅斯年(1896-1950)。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傅斯年接任臺灣大學校長。同年八月，何定生即獲聘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因此當傅斯年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猝逝時，他在二十一日晨間驚聞傅斯年過世的消息時，「知遇之感頓時盈胸，至靈堂痛哭失聲」，賴王叔岷教授(1914-2008)之牽扶方能立¹³。但不知為何傅斯年將持有燕京大學歷史系文學士畢業文憑、燕大研究院歷史部肄業的何定生聘任為中文系講師，而非歷史系？雖然何定生也曾在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就讀過，但並未取得正式文憑。進入臺大中文系後的何定生，其研究和教學的重心又轉回到跟隨顧頡剛時代用功較多的《詩經》¹⁴，自此再也沒有任何史學方面的論著。如果當初傅斯年安排他進入臺大歷史系任教，他是否會成為一位近現代史的學者呢¹⁵？

(四)何定生在此函中又提及「以趙時化名入燕大肄業」，但卻「因年事稍長而又化名就學，曾為人所注意，招來蜚語(謂生乃欲藉此作政治活動)，幾遭排斥(大學院長會竟為我事集議數次)」。所謂政治活動，若對照《顧頡剛日記》所述，當是從事國民黨的黨務工作¹⁶。而在其家屬和學生的印象中，何定生似乎曾從事敵後工作¹⁷。這或許可以解釋，他為何要改用化名進入燕京大學就讀，因為當時北平已淪

¹³ 以上敘述參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頁5、12-13。

¹⁴ 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頁319；楊晉龍：〈何定生先生傳(1911-1970)〉，同前書，頁728。

¹⁵ 李東華(1951-2010)在《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一書中，對傅斯年擔任臺大校長時期重整文學院師資陣容的努力，給予高度的評價。他歸納傅斯年當時聘任教師有三項特徵：其一，延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菁英大量進入臺大任教。其二，新聘教師研究取向遠遠大過以往之教學取向。其三，用人不拘一格，無學派門戶之見。他以中文系的牟潤孫(1908-1988)、何定生與歷史系的姚從吾(1894-1970)、方豪(1910-1980)等人為以研究著名之顯例。又舉何定生為疑古派顧頡剛弟子，為用人不拘一格之例證(頁161-162)。牟潤孫與何定生同樣具有燕京大學史學專業的背景，何定生雖曾肄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但牟卻不曾就讀過中文、國文系所，傅斯年將他們安排至中文系任教，而非歷史系，箇中緣由，頗令人好奇。

¹⁶ 參車行健、徐其寧：〈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頁206-207。

¹⁷ 此事本人曾聽聞何念貽女士說過。又其弟子曾志雄教授在〈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一文中，也回憶道：「後來抗戰發生，他為了做敵後工作，跑到山東當教員，掩飾身分。」引文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73。

陷於日寇之手，對曾經從事過黨務工作的何定生而言，這是不得已的做法。但也因為他採用化名，加上年歲又大於一般的大學生甚多，因此會招來蜚語，被人排斥。這種情況在當時氣氛緊張肅殺的淪陷區的大學校園內，當非罕見。

儘管如此，何定生在燕大校園中的日子還是過得挺充實的，除了學業的精進外，最大的收穫就是學好了英文。他在此函中還特別向恩師顧頡剛報告此事：「生在燕大雖因得通英文，以知有學問、有世界。」英文之習得，為他開啟了更廣大的學問之窗，甚至也讓他日後得以在天津《益世報》「國際周刊」中翻譯文稿以賺取稿費¹⁸。除了外文的收穫外，他又曾跟一位意大利女聲樂老師學習聲樂，因而培養了他喜歡音樂的興趣。此外，他也在燕大校園注重體育的風氣下，跟外國教練學習網球¹⁹。總的來說，他的二度大學生活可算得上是多彩多姿的。

(五) 何定生在此函中也花了不少筆墨向顧頡剛說明他與傳教士的來往，以及與基督教的關係。中間的關鍵人物就是他信中所說的蒲教士 (Miss I. Pruitt)。一開始接觸蒲教士可能是因為健康的因素，他向顧頡剛說道：

復因蒲教士得 Dr. Hills 之診治，使腦系宿疾得以霍然，此為生自經驗之奇跡，急欲為吾師告者。嗣又因蒲教士之教督鼓勇投考燕大，遂終得窺學問門牆，稍藥愚暗。此二事者生謂為新生之雙軌，缺一不可。

因蒲教士而治愈痼疾，復因蒲教士，以趙時化名進入燕京大學就讀，讓他有靈與肉皆獲新生的驚喜，他將此視為奇跡。在此奇跡的指引下，他得以進入基督教的世界，這中間的心路歷程應是有跡可尋的。他來臺之後信教益篤，所撰日記內容也多主要是關於宗教靈修的體驗，而鮮少於其他俗世層面事務的記載，讀書治學之札記亦罕見於其中。但從他公開發表的學術論著來看，並沒有太多與基督宗教有關者，更沒有執基督教神學學理及概念來解讀中國經典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學、教分離」的態度，這點頗值得玩味。

(六) 何定生寫給顧頡剛此函除了「藉尺書申積愆」，向恩師報告近年來之行跡動態及申抒感懷衷曲外，最實際的目的應是函末提出的請求：

¹⁸ 參車行健、徐其寧輯錄：〈附錄：何定生教授論著目錄（增訂稿）〉，頁 130-131。案：從其論著目錄中來看，何定生在 1929 年前即有譯作刊載於報刊雜誌中，因而對其自述「在燕大雖因得通英文」，恐怕不能單純地理解為由絲毫不通而至於全面通習的狀態，應該只是一種對比於之前的程度，而更加精進的相對說法。

¹⁹ 以上俱見曾志雄：〈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頁 70、72。

生邇來體力甚勝於昔，心境亦較有著落，第願得一機緣俾貢獻其誠意，師能不以為棄材而拔擢之否乎？曩者漠視計畫，今求有計畫而不得，師幸憐而教之，勿遽不能盡欲言。

從事後結果來看，何定生的請求應是未遂其願。但實情如何，在缺乏顧頡剛回應資料（書信及日記）佐證的情況下，恐難得知。有趣的是，曾被友朋門人視為「廣大教主」、「通天教主」的顧頡剛²⁰，的確也常會面對學生類似的請求。顧頡剛於一九二九年從廣州北返故都北平，執教燕京大學後所收的第一批學生中的牟潤孫，雖然在學術興趣和研究路向上與顧頡剛不相契合，而親近於陳垣(1880-1971)的勵耘學風，因而表現出「身在顧門，心在勵耘書屋」的尷尬處境，甚至形同「破顧門」、「入陳室」的情況²¹。但到出社會，面臨求職的壓力時，依然回過頭來請求顧頡剛為其謀出路²²。顧頡剛對何定生的關愛遠甚牟潤孫，在何定生追隨顧頡剛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北平時，一開始吃住皆在顧家，後來雖因二人齟齬而分道揚鑣，但此時的顧頡剛仍很關心何定生的出路與生活問題²³。顧頡剛在當時正是學術事業如日中天之時，手邊的資源也讓他有「顧老板」的稱號²⁴，如果何定生此時仍跟隨顧頡剛，以顧頡剛

²⁰ 參拙著：〈田野中的經史學家——顧頡剛學術考察事業中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頁102，註15。

²¹ 參拙著：〈顧門中的勵耘弟子——牟潤孫經史之學的面向及其所反映的師承關係〉，《林慶彰教授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頁603-623。

²² 顧頡剛曾在1935年7月17日修書回覆牟潤孫，答以：「數度枉過，歉仄奚似。兩函均讀到，敬悉。此間局面過小，添員甚難。今欲為兄告者，只要兄努力以成其學，弟總有法子解決兄之困難。」（顧頡剛：〈致牟潤孫〉，《書信集》卷3，收入《顧頡剛全集》，第41冊，頁42）。拙著〈顧門中的勵耘弟子——牟潤孫經史之學的面向及其所反映的師承關係〉曾對此做過如下的推測：「從顧頡剛的信中可知，牟潤孫當是託顧頡剛謀職求事，但所謀何事，信中未明言，日記也未詳記。考顧頡剛於該年三月獲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聘為該院歷史組主任，七月一日正式上任，聘了不少故舊與門生，或任會員，或司編輯，或做助理，但牟潤孫不與焉。牟潤孫兩度致函顧頡剛所謀之事者，或即為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之職務。」

²³ 參車行健、徐其寧：〈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頁206。

²⁴ 顧頡剛執教燕京大學時的學生王鍾翰(1913-2007)，曾生動地從學生的角度來描述顧頡剛在當時北平學界的地位。他說：「三十年代中，當時學術界流行的教授知名度高的，地位也高的，像胡適稱胡老板，顧師稱顧老板。先生既稱老板，學生像我自然是小伙計了！」（見氏撰：《王鍾翰清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冊，頁1926；第4冊，頁2584）。當然，學人而有「老板」之稱，並非只是單純的名氣大、地位高，伴隨而來的往往是實際的學術資源的掌握。顧頡剛全盛時期身兼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和禹貢學會領導者，同時擁有三

需才孔亟的情況下，勢必能為何定生安排一份可滿足學術及生活需求的工作。但抗戰勝利後，選擇到上海經商的顧頡剛，並未回到他曾經企求「狐死首丘」的北平²⁵，箇中原因頗為複雜，顧潮和王學典都曾做過解釋，可以參看²⁶。顧頡剛此時可能一方面是置身於百廢俱興、諸業蕭條的戰後重建環境中，自謀生計尚且勉強，如何有餘裕照顧以前的老學生？另一方面當然也因未重返北平主流學術界的舞臺，已不復當年身兼數職的「顧老板」的聲勢，因而收到信後的顧頡剛，或許也只能用「已讀不回」來權充他的回應方式。這其間反映出的，不只是何定生個人的悲哀，更是整個大時代的悲哀！亂世之中，人不能盡其才，奈何²⁷？！

套人馬，這些名義和實質上的資源，可讓他充分驅使去實現他的學術理想和志業。因而，從學生的眼光來看，顧師頡剛無疑就是一位神通廣大的老板。相關討論又參拙著：〈田野中的經史學家——顧頡剛學術考察事業中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頁 101-102。

²⁵ 傅斯年於 1928 年 4 月 2 日致函胡適 (1891-1962) 時，曾戲稱：「頡剛望北京以求狐死首丘。」（參見傅斯年：〈致胡適〉，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7 卷，頁 56。）

²⁶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 220-227；車行健、徐其寧整理：〈賢嗣傳家學，古史有餘音——顧潮教授訪談錄〉，《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頁 217（此文原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9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109-126）及王學典主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252-253。

²⁷ 何函寄出八個月後的 1947 年 1 月間，當時擔任臺灣大學校長的陸志鴻 (1897-1973) 傳出有意聘請顧頡剛來掌臺大文學院，此事雖以顧頡剛致信陸校長懇辭告終（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 227；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頁 97），但頗可引起不少慨歎唏噓。戰後的臺大可能是他們師徒再一次重逢與合作的交會點，但人的命運往往受制於歷史的曲折，顧頡剛就曾在 1948 年年底的日記中感歎說：「在此大時代中，個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聽之於天而已。」（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6 卷，頁 397）。何定生進入臺大任教後，他或許也曾聽說過此傳聞，然而又能為之奈何？

